

袁進〈近代西方傳教士對白話文的影響〉讀後

• 張衛東

袁進的〈近代西方傳教士對白話文的影響〉^①（以下簡稱「袁文」）指出「十九世紀歐化白話文」被忽略，肯定近代西方傳教士翻譯《聖經》和讚美詩對白話文學的積極影響，這都是筆者贊同的。然而，袁文認為：一、「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是新文學的語言先驅」，二、西方傳教士「在漢語的語法、辭彙、語音三方面，都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人們何以忽視了以上這兩點？那是因為：三、「我們以往的研究受到民族主義影響，把漢語書面語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轉變看成是漢語內部的轉變，很可能低估了近代『西化』、『全球化』的力量。」以上三點，願與袁進先生商榷。

一 西方傳教士「創作了」 「歐化白話文」？

袁文反覆強調西方傳教士「創作了最早的歐化白話文」（頁78），「新文學所用的語言就是以前西方傳教士所

用的歐化白話」，因而「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是新文學的語言先驅」（頁82）。這種新白話的創作權、發明權歸屬西方傳教士，「因為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在晚清即使是與西方傳教士合作翻譯的士大夫也寫不出這種文體的序跋，只有西方傳教士因為受過專門的英文訓練，才寫得出這樣的序跋，這就是一篇現代散文」（頁80）。（這最後一小句，疑為病句，當改為「才寫得出這樣的序跋，這樣的現代散文」。）

其實，據我們所知，跟西人有關的同時代現代白話作品，並非僅傳教士一家。眾多非傳教士漢學家的作品，較之袁文例舉的傳教士「歐化白話文」多是更勝一籌。例如英人威妥瑪(Thomas F. Wade)的《語言自邇集》(1867年第一版，1886年第二版)，他那些課文所使用的，正是地道的「中國白話」^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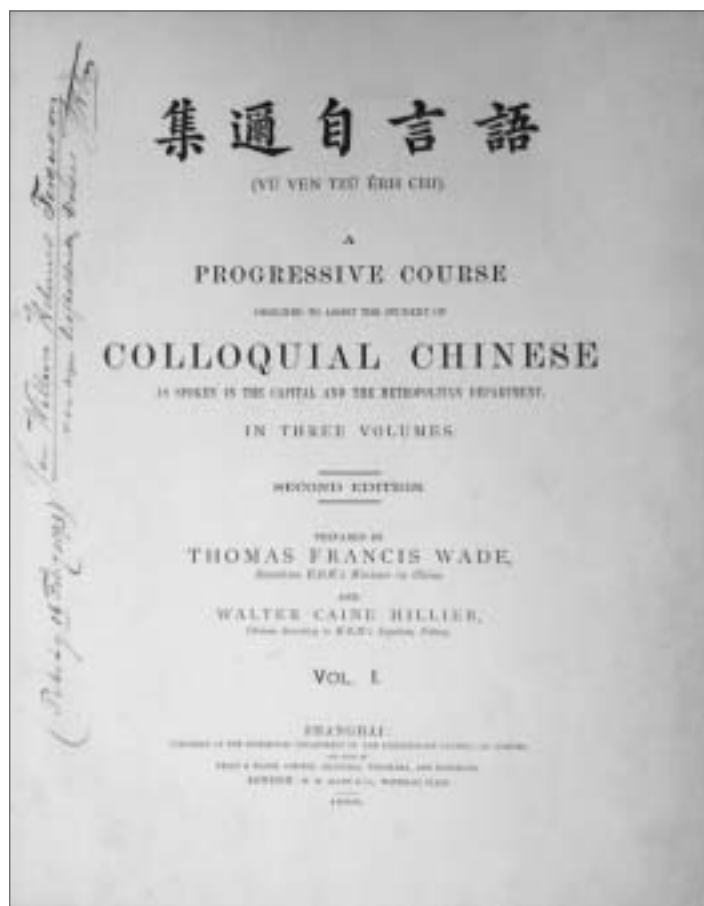
1、〔長者〕你啊，是個很好的人，心裏沒有一點渣兒，就是嘴太

跟西人有關的同時代現代白話作品，並非僅傳教士一家。眾多非傳教士漢學家的作品，較之袁文例舉的傳教士「歐化白話文」多是更勝一籌。

直。知道了人家的是非，一點兒也不肯留，必要直言奉上。雖然交朋友，有規過的道理，也當看他的為人，可勸再勸罷咧。若不這樣兒，只說是個朋友，並不分親疏就勸，那如何使得呢？方纔說的這些話，那不是好什麼？他倒心裏很不舒服。瞪着眼，疑惑着說：噯呀！要小心啊！保不定這是害我罷？

2、〔少年〕兄台，你說的這些話，實在是給我治病的良藥啊！我很信服。這原是我一生的毛病兒，我豈不知道麼？就是遇見這樣兒的事情，不由的嘴就癢癢，說出來。古人原有「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的話啊。從今兒起，我痛改前非罷，日後再要這麼樣兒多說話，縱使兄台往我臉上啐唾沫，我也甘心領受！（談論篇百章之六十七 [Lesson LXVII]

「西方傳教士的白話文」之所以好，是因為他們用中國教眾熟悉的「官話土白」，才能獲得最佳布道效果；而「五四作家寫的白話文」不那麼好，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學好群眾語言。圖為1886年再版的《語言自邇集》。



威妥瑪能夠做到這一步，除了他本人的漢語造詣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合作與幫助——對於這一點，威妥瑪反覆強調，從不含糊。他曾說過^③：

我的為人是，我不能讓自己相信我對漢語的認識會跟我的中國老師一樣好，而且，我自己編排出版的漢語課本，若沒有一位合格的審查人在我左右，那是我不能認可的。

《語言自邇集》出第二版時作了一項重大修改：將《西廂記》改編為白話長篇，作為綜合的口語練習材料。其創意來自中國學者，至於具體工作，也主要是靠「幾位中國朋友」。威妥瑪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讓學生「學習像在北京講的那樣的漢語口語」，而其教材的「優勢在於擁有本地人說話的自然氣質」^④。

協助威妥瑪的是怎樣的中國人？是「口語非常好的本地老師」。工作程式是怎樣的？「對我所說的話，他當然是先行糾正再予記錄」，「那以後」又「讓勝任的本地人不止一次地仔細潤色過」。威妥瑪及其《語言自邇集》追求的目標是「擁有本地人說話的自然氣質」、「更符合(本地的)語言習慣」，從而讓學生「學習像在北京講的那樣的漢語口語」。

當時的傳教士翻譯《聖經》等，當亦與此相類。《聖經》等翻譯作品，也是在中國人的協助下完成的；所用的語言，就是當時中國普通百姓平日說的、已經「習慣」了的「口語」、「官話土白」，是地地道道的「土產」而非「舶來品」。袁文的一段引文也是這麼說的：「有學者指出：『當時在《聖經》翻譯的問題上，有許多困難問題，大都

由西人主任，而聘華人執筆，……文言不能普遍於普通教友，於是官話土白，而官話土白又為當時外界所詬病。卻不料這種官話土白，竟成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鋒。』(頁82)但不知為甚麼，袁文卻非要把這種在中國土地上生成起來的、早已客觀存在的、「普通教友」早已習慣了的「官話土白」定位為西方傳教士「創作」的「歐化白話文」？

袁文還說「西方傳教士的白話文有的比五四作家寫的白話文更像後來的白話文，是因為它們是直接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即使不是翻譯是創作，也是用外文先想好了，然後翻譯成漢語。」(頁84)此等「翻譯論」，亦非所聞也。「西方傳教士的白話文」之所以好，並非「因為受過專門的英文訓練」或「直接從外文翻譯過來」，而是因為他們懂得：用中國教眾熟悉的「官話土白」，才能獲得最佳布道效果；而「五四作家寫的白話文」不那麼好，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學好群眾語言。

二 西方傳教士「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

袁文歸功於西方傳教士的另一點是：「他們在漢語的語法、辭彙、語音三方面，都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頁82)

語言學常識告訴我們，儘管「外來新事物帶來大量的新辭彙」(頁82)，然而，並不能改變漢語的基本辭彙和一般辭彙系統；儘管「最早的語法專著《馬氏文通》就是在外國語法啟示下成書的」(頁82)，卻不能說沒有「語法專著」就是沒有「語法」。至於「語音」，袁文則說：「一般人可能會

覺得，漢字的語音是中國人自己確定的，它來源於中國人自己的生活與社會，與西方傳教士又有甚麼關係？」(頁82)難道不是這樣麼？「一般人」這種觀點何錯之有？袁文解釋道：「其實，西方傳教士對漢字語音的認定做出過重要貢獻，不過這些貢獻不是在確定漢字的讀音上，而是在如何辨別漢字的讀音上，以及確立表達語音的文字上。」(頁82)再往下讀，方見落腳於「明末的西方傳教士提出了最早的中文拼音方案」(頁83)。然而，這算甚麼「漢字語音的認定」呢？其作用又如何談得上「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

袁文又說：「經過不斷的翻譯磨合，大概在十九世紀50年代之後，古白話漸漸退出歷史舞台，歐化白話開始登上歷史舞台。」(頁78)袁文時常將「言」「文」相混。上面這段話，便將「歐化白話文」出現的時間與「白話」形成的年代相混淆，好像在「歐化白話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之前，中國就沒有自己的「官話土白」。

其實，「官話土白」的客觀存在，在早期傳教士那兒已有明確記載。西班牙傳教士瓦羅(Francisco Varo)在《華語官話語法》(1682年成書，1703年廣州出版)第一章「誠律之二」就曾明確指出：「漢語有三種說話的語體(modes of speaking)。」第一種是文言，「是高雅、優美的語體，很少使用複合詞，……這種語體只是受過教育的人們中間使用，也只有他們才能懂。……第二種語體處於高雅與粗俗之間的中間位置。它能夠被大多數人所理解，也使用一些複合詞；……第三種是粗俗的語體，可以用來向婦人和農夫布道。」為了讓大家明白這後兩種語體的實際用法，瓦羅舉

袁文將「歐化白話文」出現的時間與「白話」形成的年代相混淆，其實「官話土白」的客觀存在，在早期傳教士那兒已有明確記載。

了如下的例句——同一個句子，兩種語體：

1、欲升天者，可行真善路，若不然，豈得到。(第二種語體)

2、但凡人要升天，該當為善。若不為善，自然不會升天。(第三種語體)

前者為古白話，後者為早期「現代白話」。瓦羅特地解釋說⑤：

第一個句子用了「欲」和「者」這兩個詞，這是一種優雅明白的說法；凡是具有中等理解能力的人，或者說話說得相當好的人，都能夠理解。在第二個句子裏，用的是「但凡」和「要」這兩個較通俗的詞，任何一個能說或者能懂一點官話的婦人和農夫，都能夠理解。

瓦羅的書，比所謂「歐化白話文」早一百五十多年。比瓦羅晚、比翻譯《聖經》至少早半個世紀的《紅樓夢》，也已經大量使用地道的「官話土白」。請看二十回的一小段：

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笑道：「咱兩個作甚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甚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

「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

還有比《紅樓夢》更早的例子。明萬曆十年(1582)，羅明堅一行到廣東肇慶，乃第一批西洋傳教士踏足中國內地。可是在此之前，在東方土地上，已經有了跟今天的「白話」相當接近的白話文字，著名的《老乞大》和《朴通事》等可以為證。且看1517年高麗朝崔世珍《翻譯老乞大》中的一段⑥：

到晚，師傅前撒簽背念書。背過的，師傅與免帖一箇；若背不過時，教當直的學生背起，打三下。

怎的是撒簽背念書？怎的是免帖？

每一箇竹簽上，寫着一箇學生的姓名。眾學生的姓名，都這般寫着，一個簽筒兒裏盛着。教當直的學生，將簽筒來搖動，內中撒一箇，撒着誰的，便着那人背書。背念過的，師傅與免帖一個。那免帖上，寫着「免打三下」，師傅上頭畫着花押。若再撒簽試不過，將出免帖來毀了，便將功折過免了打；若無免帖，定然喫打三下。

到1795年朝鮮朝的《重刊老乞大》，進一步「現代化」：

《翻譯老乞大》：

晚 背過的 怎的 這般 着
與 撒簽 無

《重刊老乞大》：

晚晌 背的熟的 怎麼樣 一樣 教
給 抽簽 沒有

袁文所謂的「歐化白話文」，不過是西方傳教士對「官話土白」的應用。早在西方傳教士抵達之前，這種白話已然通行於中土，並且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演變；「官話土白」的書面語形式，亦早在西方傳教士翻譯《聖經》之前，已見於中土。

這樣的白話，這樣的文字，是高麗／朝鮮司譯院編來作為課本、教授他們的譯官通事學習「漢兒言語」、中國「官話」的。從元末至清季，《老乞大》不斷修訂重刊，現存十餘種版本。依時序排開，就會發現，這些版本是與時俱進的，是追隨着中國本土漢語口語的變化而變化，絕對沒有西洋傳教士插手染指。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高麗朝、朝鮮朝司譯院的「質正制度」。

1720年朝鮮《通文館志》卷三《事大·赴京使行》載：「國初，歲遣朝京之使，有冬至、正朝、聖節、千秋四行，又多有臨時之使，每使皆有「質問從事官一員」，專責詢問「吏語、方言之未解者」。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譯官邊憲隨朝鮮使團到燕京，同中國學者一道，對《老乞大》逐字逐句討論、修訂，形成了《老乞大新釋》和《老乞大新釋諺解》。其使團首長洪啟禧為《老乞大新釋》作〈序〉云：「我國古置質正官，每歲以辨質華語為任。故東人之於華語，較之他外國，最稱嫻習。……及庚辰銜命赴燕，遂以命賤臣焉。時，譯士邊憲在行，以善華語名。賤臣請專屬於憲。及至燕館，逐條改證，別其同異，務令適乎時便於俗……今此新釋，以便於通話為主」。質正之鵠的，就是與當時漢語官話口語相一致。

袁文所謂的「歐化白話文」，不過是西方傳教士對「官話土白」的應用。早在西方傳教士抵達之前，這種白話已然通行於中土，並且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演變；「官話土白」的書面語形式，亦早在西方傳教士翻譯《聖經》之前，已見於中土。將所謂「歐化白話文」的作用定位於「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實在是說不通。

三 「現代白話的轉變」難道不是「漢語內部的轉變」？

在語言學方面，袁文先是責難於學界兩點：一、不承認「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是新文學的語言先驅」；二、認識不到西方傳教士「創作了最早的歐化白話文」、「他們在漢語的語法、辭彙、語音三方面，都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而究其根源，則在於：三、「我們以往的研究受到民族主義影響，把漢語書面語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轉變看成是漢語內部的轉變，很可能低估了近代『西化』、『全球化』的力量。」（頁85-86）

如此說來，問題嚴重：「民族主義」「作繭自縛遮蔽了我們的視野」，語言理論的偏差「掩蓋了某些歷史真相」。

「把漢語書面語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轉變看成是漢語內部的轉變」，錯了？「漢語書面語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轉變」不是「漢語內部的轉變」，而是西方傳教士「直接從外文翻譯過來的」或「是用外文先想好了，然後翻譯成漢語」、從而「創作」了「歐化白話」，接續了「古白話」才讓「現代漢語」得以「建立」？不必討論哲學上的「內因」、「外因」、「根據」、「條件」等概念及其相互關係，也不用去討論宋元以來語音系統的簡化導致辭彙系統的繁化、語法結構多樣化的轉變，我們只看《老乞大》九個版本前四句所反映的漢語由古白話到現代白話的「轉變」，便可一目了然：

老一：

恁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有？

不用去討論宋元以來語音系統的簡化導致辭彙系統的繁化、語法結構多樣化的轉變，我們只看《老乞大》九個版本前四句所反映的漢語由古白話到現代白話的「轉變」，便可一目了然。

俺漢兒人上學文書來的上頭，些小漢兒言語省的有。

你誰根底學文書來？

我在漢兒學堂裏學文書來。

老一為元末刊行本，有不少元代漢語的元素，如句末語氣詞「有」，第一人稱代詞「俺」、第二人稱代詞「恁」，等等。朝鮮《成宗實錄》成宗十年(1480)有云：「侍讀官李昌臣啟曰：前者承命質正漢語於頭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即以時語改數節，皆可解讀。請令能漢語者盡改之。」於是，有了反映元明鼎革後的新版本：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

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小漢兒言語省的。

你誰根底學文書來？

我在漢兒學堂裏學文書來。

老四、老五、老六、老七皆為諺解本，其漢文變化不多，但反映了語音方面多多少少有些變化。

老八、老九：

你卻是朝鮮人，怎麼能說我們的官話呢？

我在中國人根前學書來着，所以，些須知道官話。

你跟着誰學書來着？

我在中國人學堂裏學書來着。

老八、老九即上文曾提到的《老乞大新釋》和《老乞大新釋諺解》，分別刊行於朝鮮英宗三十七、三十九

年，即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十八年(1763)，既反映了韓半島由高麗朝到朝鮮朝的變化，更反映了中國本土漢語語音、辭彙、語法各方面的各種變化。

乾隆年間的《紅樓夢》與《老乞大新釋》、《朴通事新釋》等，是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完全由東方人手書的「中國白話」，完全沒有西方傳教士參與。漢語循着自己的道路演進，由古白話逐步漸變為今白話。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翻譯《聖經》用的「歐化白話」之類的「外因」，無論如何是「作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的《紅樓夢》與《老乞大》、《朴通事》等。「漢語書面語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轉變」就是「漢語內部的轉變」，堅持這種觀點，是基於對歷史的考察，談不上甚麼「低估了近代『西化』、『全球化』的力量」和「民族主義影響」。

註釋

① 袁進：〈近代西方傳教士對白話文的影響〉，《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12月號，頁77-86。相關引文後附其所在頁碼。

②③④ 威妥瑪(Thomas F. Wade)著，張衛東譯：《語言自邇集——19世紀中期的北京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260；8；17。

⑤ 瓦羅(Francisco Varo)著，姚小平、馬又清譯：《華語官話語法》(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頁11-12。

⑥ 崔世珍：《翻譯老乞大》，原本國語國文學叢林(大提閣，1986)，頁10-12。

張衛東 深圳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音韻學會理事，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理事。